

徘徊在圣俗之间：汶川地震灾区女性宗教信仰研究

李海梅 谢海欣

提 要：在灾难的特殊“场域”中，女性宗教心理与宗教行为的变化能够更好地展现宗教的本质及其与社会的关系。“5.12”汶川地震灾区女性信教行为变迁表明：中国妇女在面临突如其来的灾难时，会作出信教的选择，而灾难过后，功利化的价值取向又使她们更多地选择游离在宗教提供的神圣场域和世俗生活的现实之间。

李海梅，博士，成都理工大学文法学院讲师；谢海欣，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关键词：地震灾区 女性 宗教信仰

纵观人类宗教实践活动的产生与发展，“灾难”在其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著名社会学家克鲁普斯（A. Krepis）就认为灾难研究为强调经典社会学家所关怀的基本命题（如社会组织的产生及其适应能力以及生存）提供了丰富的资料^①。“综观宗教与妇女的历史，可以发现两者的关系是如此密切，妇女始终是宗教的积极支持者和虔诚信奉者。”^②尽管女性在各大宗教社团中的地位受到这样或那样的限制甚至是剥夺和歧视，但并未妨碍妇女对宗教投入热情，世界宗教发展史表明自宗教产生特别是宗教发展到神学宗教阶段，始终无法或缺女性信众的身影。而在不少人眼里，中国是个没有宗教的国家，中国人是个不迷信宗教的民族^③。即使中国社会有宗教，那也是区别于西方的普化宗教，即神佛皆灵，只要虔诚，有求必应^④。在这种实用主义诉求的驱动下，中国人对宗教的态度总是表现出功利性的一面，逢庙烧香，遇像磕头，只为能得到保佑。而自然灾害面前，中国女性所表现出的信教行为变化更清楚地表达出这种现实导向型的信仰机制留下的痕迹。

一、灾难爆发期：信仰并行动

2008年5月12日发生在四川汶川的里氏8级特大地震，波及10省（市）、417县、4600多乡镇、近4.8万个村庄，受灾人口4000多万，涉及转移安置人口1500多万，死亡及失踪人数

达8万多，被掩埋和死亡的各种牲畜和其它动物800多万头（只），交通、通讯中断，基础设施全面毁坏，造成整个灾区直接经济损失8000多亿。一时间，江河流断、生命倾覆、苍天闭眼、大地失聪，整个国家被地球瞬间能量释放造成的巨大灾难所刺伤^⑤。在灾难突然降临的特殊场域中，害怕、麻木、惊吓和困惑，一时间灾民情绪强烈。在大自然灾难的强大冲击下，个体甚至群体是那么渺小，目睹同胞或同伴的死亡、伤残，丧失亲人、与亲人分离或无法取得联系等，都会造成对个体身心极大的打压，出现混乱、不安、恐惧、紧张、惊慌等情绪反应。于是对自然灾害的恐惧，对已逝亲人的痛惜，对未来生活的憧憬与迷惘等复杂情绪共存成为汶川地震灾后第一时间内灾区群众的基本群体心理。而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宗教信仰以它特有的完满性、超验性在安抚心灵、救赎生命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与此同时，伴随着各宗教团体对汶川地震灾区群众提供的包括物质支援和心理支持等各类援助的日益增多，灾区群众对宗教的依赖程度逐日递增，灾区信教人数开始上升，其中女性信教人数的攀升尤为引人注目。据对汶川地震灾区千佛寺、广莲寺和云溪镇基督教教堂三个调查点的实地调查，从2008年5月12日到2008年7月4日《国务院关于做好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的指导意见》发布，也就是地震发生后的第一个阶段——救灾期，在此阶段，伴随着救灾活动如

如火如荼地开展，大量女性开始加入宗教团体，参与和从事宗教方面的活动，而其中很多女性皈依成为正式的教徒，完成了从世俗身份向宗教身份的转变（见图 1，2），在访谈中有接近 80% 的女性认同加入宗教团体能够积德避难，有 70% 的痛失亲人的女性教徒认为可以在宗教勾画的彼岸与亲人重逢，而也有不少女性享受着宗教团体在灾难来临时所提供的一种亲人般的心理抚慰和团体归属，这就像是在验证着一个千百年来不变的真理，即灾难在宗教起源和发展过程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由于地震强大的破坏力，给亲历灾难的女性造成了极大的心灵震撼和内心恐惧，在让她们真切地感受到对死亡无助的同时，也产生了对逝去亲人的彼岸寄托和心灵哀思，从而萌发了对“无限者”的体认，即看到的背后存在着看不见的东西，在自然的背后存在超自然的东西、在有限的背后或内部存在有超有限即无限^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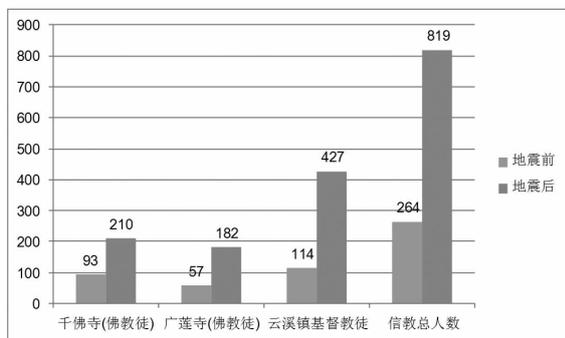


图 1 震前震后皈依总人数变化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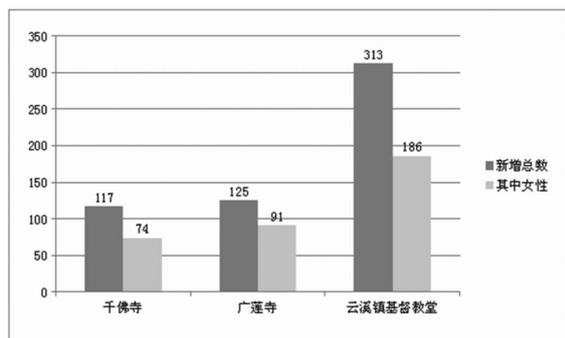


图 2 女性在新增教徒中分布情况

二、过渡安置期：恢复中的双重选择

《国务院关于做好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的指导意见》正式发布，标志着汶川地震灾区由救灾期正式过渡到灾后重建阶段。随着大规模搜救的基本停止和灾难的逐渐远去，政府的工作重点转向了对灾区的恢复与重建，灾区人们逐渐步入正常的生产生活。与此相对应，汶川地震灾区女性对宗教的信仰也从充满激情的状态逐渐趋

于平静，而已经皈依的女性教徒的宗教行为也逐步转向了较为平淡的日常宗教活动，如反反复复的念经礼佛、祈祷礼拜等。访谈中不少女性表示还是很愿意参加社区附近的宗教场所开展的宗教活动，但有时候因为工作或生活方面的事忙不过来也会耽搁，而该时期千佛寺、广莲寺和云溪镇基督教教堂的信众和教徒数量也趋于稳定。如果说汶川地震爆发时灾区女性因受到自然灾害的直接影响而选择顿悟式地崇信宗教、甚至做出皈依宗教的行为，过渡安置期的灾区女性则具有了宗教提供的神圣场域和世俗生活的双重选择。

一方面，具体的宗教仪式与宗教活动向来是任何宗教行为的物质载体。地震发生后，灾区增加了不少与抗震相关的宗教性活动，活动内容和频率也增长明显。有研究表明，与男性相比，汶川地震灾区女性在心理方面遭受了更为沉重的打击，尽管灾难已经发生，但很多女性会强迫性地在脑海中反复出现地震时的画面、声音、味道等具体场景，会对地面晃动很敏感、恐惧，害怕独自呆在较为封闭的空间，更加不愿意提及与地震有关的话题。但是，通过参加相关的宗教活动，她们都较好地摆脱了这些负面的心理情绪。所以，汶川地震灾区女性不但信仰宗教的人数较平日激增，而且在日常宗教活动与宗教仪式中，她们更喜欢参加礼拜、祈祷和带有文艺或演出性质的集体活动，因为活动结束后，她们基本上都会从主观情绪上得到较大的改观，感到充实而快乐^⑦。于是，通过参加一些宗教仪式和宗教活动，不但能够得到精神安慰，而且宗教信念也帮助她们平息甚至消除在地震中所郁积的各种负面情绪，灾区女性在“享受”宗教“圣域”带来的解脱的同时，也对宗教产生了认同和依赖。

另一方面，随着灾区重建工作的推进，在经过对现实的考量之后，灾区女性对宗教的依赖和热情也逐渐减退。地震发生后，对比男性而言，汶川灾区女性对宗教表现出了更为强烈的宗教情感和更为积极的宗教行为。通过参与不同的宗教仪式并从中获得不同的宗教体验，缓解了她们由于地震而产生的种种不良情绪，在此基础上，她们形成了以依赖感为核心的宗教情感，甚至有女性对宗教产生了狂热化的依赖与虔诚。但整体上看，她们的宗教观念水平较低，其宗教信仰中的理性成分不够，也就是说，不少信众甚至是部分新增教徒的信仰行为，并非是出于对宗教所倡导的理念思想大彻大悟后在追崇无限中所作出的理性行为。大灾所造成的社会失范和无序毕竟是短

暂的，随着灾难的远去和社会秩序的恢复，现实层面的事务摆在了人们的面前，重拾生活的渴望使得宗教部分功能很快被替代。大地震爆发时笼罩在灾区上空的“悲壮情绪”在盘旋中逐渐消褪，也逐渐转化为灾区人们对被毁家园的重建决心和行动的力量，灾区人们从“地震诗歌”和国家哀悼日中坚强重生。与此同时，国家关于灾区重建的相关制度和政策相继出台并实施，灾区人们投入了重建的伟大工程中。尽管宗教带给灾区女性的心灵抚慰功能并未消失，但世俗生活逐步将她们从彼岸拉回了现实，灾区女性选择了在圣俗之间找到能让自己最舒适的平衡点。

三、后地震时代：社会重构中游离

这里的重构可以从两个维度进行解读：一是灾区客观环境的重新构建，如基础设施重建；二是灾区人们社会关系网络的重新整合、构建与调适。尽管2012年2月，伴随着四川省人民政府宣布汶川特大地震四川灾区恢复重建工作胜利完成，汶川地震灾区进入了建成期，但多数人更倾向于认为灾区重建将会持续更长的时期——也就是有人提出的后地震时代，其中比基础设施建设更重要的是灾区人们社会格局和社会关系的重建。

在摧毁了灾区人们赖以生存的建筑物、造成人员伤亡的同时，地震还造成了对灾区人们社会生活和社会秩序的强烈冲击与破坏。家庭、邻里、小区、社区、单位同事等社会关系网络不再健全；很多群众经历了多次转移安置，不但离开了自己熟悉的生活场所，原有的群体关系、乡村自治组织和社区功能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总之，灾难发生前灾区人们的原有社会格局和社会关系几乎被彻底打破，个人发展遭遇不同程度中断，社会旧有运行机制被打乱，严重影响了人们的正常生活。于是，社会关系网络的重构成为灾区重建的重中之重。

而与女性在地震爆发时选择信仰和皈依宗教、在过渡安置期拥有神圣与世俗两种选择不同，后地震时代灾区女性对宗教采取了若即若离、游离不定的态度。随着灾后重建工作的进一步推进，灾区女性与宗教之间距离的保持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首先，女性信教人数增长率骤降。尽管“后地震时代”女性信教人数还在不断增加，但已经由先前的“井喷式”变为了“细水长流”。其次，宗教活动现实主义色彩激增。重

建完成后，地震灾区女性对参加宗教仪式、活动的热情明显下降，甚至已经皈依的女性教徒的宗教趣味也从日常宗教活动转向节日化、世俗化的庆祝活动。最后，女性信教群体分化为“核心群体”与“外围群体”。随着后地震时代的到来，灾区女性对于自身与宗教之间关系的保持出现了分化：部分女性继续保持了与宗教组织较为密切的联系，按时参加日常宗教仪式与宗教活动；也有部分女性与宗教组织的关系变得较地震发生时松散得多，非但不能按时参与日常宗教仪式和宗教活动，而且在个别宗教活动场所也只看重自身的感受、以满足自身社会性需求为主，她们与宗教组织之间呈现出一种“若即若离”、“脱而不离”的微妙关系，反应在群体行为上，则出现了相对于宗教而言的“核心群体”与“外围群体”。

四、宗教：灾难面前社会整合的临时功能性替代品

尽管信仰宗教在大地震爆发的第一时间为灾区女性提供了神圣的情感寄托场域，但大部分女性从头到尾均对宗教持功利主义的态度倾向。由灾难爆发时选择信仰甚至皈依宗教，到灾后过渡安置重建期间在宗教神圣场域和世俗生活之间选择，再到后地震时代对宗教热情的消褪，灾区女性借助神灵的力量完成了自我的重塑。

但灾区女性对宗教态度的前后变化不应该被视为“另类”，这符合中国人对宗教的总体取向，因为在社会学家杜尔凯姆看来，客观社会存在才是宗教产生的根源，宗教所崇拜的真正对象也只能是社会现实本身^③。汶川特大地震给灾区人们特别是女性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家园被毁，亲人离散甚至刹那间阴阳相隔。面对灾难带来的死亡伤害和旧有的社会格局、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遭遇不同程度的破坏，灾区女性可谓身心疲惫。而宗教的适时出现抚慰了她们受伤的灵魂，填补了她们虚惘无助的内心，宗教发挥了重要的心理抚慰和调适功能，一时间宗教成为灾区很多女性应对灾难危机的重要必需品。实际上，灾区女性在宗教中寻求的并非超验的、抽象的教理教义或者严谨刻板的宗教生活，所谓的宗教情感，只不过是对受到自然灾害重创的社会格局、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一种无意识的缅怀与追求的心理折射而已。

首先，宗教实现了对灾区女性实践个体的“重塑”。在社会学家帕森斯著名的社会结构功能

AGIL 模式中，“整合”（Integration）居于核心地位，是社会系统为防止出现相互冲突与失范的现象而对内部不同的社会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进行协调、调整和控制，以保证社会的良性运行。突如其来的特大地震，让灾区人民的社会生活顷刻间遭受重创，原有的社会格局、社会关系土崩瓦解，也让灾区社会成员心理上处于无序状态，内心充斥着失落、恐惧、焦躁与不安，灾区社会处于失范状态。由于在地震中的特殊经历，不少灾区女性个体产生了严重的认知偏差和心理焦虑、既有社会关系损毁诱发的社会角色的失败现象，此时宗教的适应出现，不但抚慰了她们的恐慌心理，通过参加宗教仪式和宗教活动、结识其他的教众，她们又重新发展了自我认识与自我定义，社会和自我价值也这一过程中重新得到了肯定，宗教在灾后第一时间实现了对灾区女性个体的“拯救”，帮助她们回归正常的社会生活轨道。

其次，宗教随着灾区社会生活的回归而退潮，灾区女性徘徊在圣俗之间。地震灾区在经历了最初的痛苦和艰巨的重建之后，已经走出了当初的阴影，无论是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都重新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灾区社会从整体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回归”。社会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 Choice Theory）认为，人以理性的行动来满足自己的偏好，并使其效用最大化^①。随着灾区社会生活的整体回归，灾区女性也开始了在真实的社会建构中按照既有的模式进行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正如马克思所言：“一个人，如果想在天国这一幻想的现实中寻找超人，而找到的只是他自身的反映，他就再也不愿在他正在寻找和应当寻找自己的真正现实性的地方，只去寻找他自身的映像，只去寻找非人了。”^②至此，宗教的“救赎”结束，神圣生活转化为了世俗生活。

最后，世俗取代灵性，灾区女性的宗教性需求消失，故而保持了与宗教若即若离的关系。随着灾难的远去和灾区重建的完成，对于灾区女性而言，宗教的“拯救”和灵性功能逐渐消褪，深刻但枯燥的宗教理论也不是她们参加宗教活动的主要原因，她们需求的是热闹非凡、能满足她们更多社会交往与情感补偿需要的大众宗教仪式。正如迪尔凯姆所言：“宗教是一种与神圣事物（即被分离出来的带禁忌性的事物）有关的信仰与实践的统一体”，“是存在于一定的社会之中，并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对于后地震时代的

灾区女性而言，现实生活比彼岸世界有更强的吸引力，宗教成为了灾难面前社会整合的临时功能性替代品。

五、余 论

从 2008 年 5 月 12 日汶川大地震爆发到 2012 年 2 月灾后重建工作的完成，汶川地震灾区经历了惊心动魄的历史性巨变。由救灾期大量女性开始加入宗教团体甚至皈依成为正式的教徒，到灾后恢复重建期徘徊在神圣与现实之间，再到后地震时代日益分化为与宗教组织保持密切联系的核心群体和与宗教组织日渐疏离的外围群体。在此期间，灾区女性信教行为也随着灾区客观环境变化而变迁。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既有基于地震带来的普遍性因素，也有基于女性心理与社会特征而带来的特殊性因素，但反映出中国人对待宗教的一贯态度和主张。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与其说宗教在自然灾害下实现了对个体与群体的救赎，不如说个人与群体借助神灵的力量完成了自我的重塑。在现有的社会条件下，宗教依然不是生活的必需品，而只是特定条件下功能性的替代品。

（责任编辑：首之）

- ① Stallings, R. A., “Weberian Political Sociology and Sociological Disaster Studies,” *Sociological Forum*, 2002, 17 (2): 281-305.
- ② 罗伟虹：《宗教与妇女的心理需求》，《妇女研究论丛》1997 年第 2 期，第 12 页。
- ③ 胡适：《名教》，《胡适文存三集》，上海：上海亚东图书馆，1931 年，第 1 卷第 61 页。
- ④ 李亦园：《宗教与神话》，台北：立绪，1998 年，第 126-127 页。
- ⑤ 郭虹、庄明：《NGO 参与汶川地震过渡安置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 106 页。
- ⑥ [德] 麦克斯·缪勒著，金泽译：《宗教的起源和发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年，第 155-156 页。
- ⑦ 那龙等：《5. 12 地震对灾民心理状况的调查》，《山西医科大学学报》2009 年第 8 期，第 709-710 页。
- ⑧ [法] 埃米尔·迪尔凯姆著，周秋良等译：《迪尔凯姆论宗教》，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年，第 12 页。
- ⑨ 侯钧生：《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416 页。
- ⑩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年，第 3 卷第 324 页。